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 父母性別差異於跨國銜轉學生語言習得、資源投放及認同建構之研究

報告類別：成果報告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9-2629-H-017-001-

執行期間：109年08月01日至110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鍾鎮城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曾韻慈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張雅玲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5 日

中文摘要：當跨國銜轉學生抵台就學時，其父母的生理及社會性別組合因素，可能影響了他（她）們對於家庭及學校課堂語言習得上的決策。因此，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跨國家庭父母性別與國籍組合之間所形成的家庭型態對於跨國銜轉學生語言習得、資源投放（investment）及認同上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採用敘事研究，針對所選定的8位5-9年級跨轉生為主要個案參與者，而在次要參與者方面，包含個案父母、華語老師及班級導師。場域觀察日誌、隨機與深度訪談將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而所蒐集之語料統計其中的性別比例，確保單一性別不少於1/3。同時，按國內跨轉生來源國之比例原則，越南背景學生占總參與者比例的1/2。資料分析以回答研究問題為主軸。本研究發現：1. 大部分個案所顯示的性別現象極為幽微隱晦，常常不以男性、女性或是兼有的型態呈現，最常見的是中立或無性別。2. 大部分個案家庭採自然狀態下的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而家庭與學校教育場域是彼此分隔的狀態。3. 當跨轉生的華語文能力越精熟時，他們會越有自信且更樂意呈現自己的不同。最後，研究者認為，僅一年時間，再加上疫情的紛擾，不足以清楚挖掘出性別、家庭、學校機構與語言四者之間無所不在的隱含。是故，針對未來從事相關議題的研究者，建議應執行長期研究。

中文關鍵詞：跨國銜轉學生、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語言習得、資源投放、認同

英文摘要：When transnational students come to Taiwan to study, their parental biological and social gender being may influence their family and classroom language acquisition decision mak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stud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investment, and identity on their family types composing by parental gender and nationality. This is a narrative study. The major participants include eight transnational students whose grades are from 5th to 8th. Minor participants include parents, Chinese teachers and homeroom teachers. The primary data sources are from fieldnotes, anecdotal and in-depth interviews. Percentage of gender emerges from the linguistic data is counted in order to ensure either gender percentage is lower than one-third. Based on the statistic data, transnational students with Vietnamese background occupy fifty percent. Data sources reflect this demographical fact and guarantee the one-third gender principle. The researcher analyzes the data by answering the three proposed research questions. Three results are found. First, most cases reveal a faint and hidden gender phenomenon. They do not present themselves as a male, female or both. They choose to behave as neutral and genderless. Second, most case families implement their family language policy with a natural attitude, and their family language contexts are disconnected with school education. Third, when trans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are getting better, they become more confident and happier to show their difference with peers. Because of the short implementation of only one year and the spread of covid-19, this study cannot clearly uncover their implicature among gender, family, school institute, and language. Thus, for future study, approach like longitudinal study is highly recommended.

英文關鍵詞：transnational students, biological gender, social gender, language acquisition, investment, identity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父母性別差異於跨國銜轉學生語言習得、資源投放及認同建構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9-2629-H-017-001-

執行期間：109 年 8 月 1 日 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鍾鎮城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曾韻慈、張雅玲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0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31 日

## 一、研究背景

台灣過往的新住民婚姻組合以一台籍加一外籍（以下內文簡稱一台一外）居多。其中的一外，又以女性居多，因此，大部分的探討幾可說是女性性別相關議題探討。據移民署（2020）統計，各縣市外裔與外籍配偶人數（不含中港澳地區）共 190,736 人，其中男性外籍配偶為 21,850 人，女性外籍配偶則為 168,886 人。由上述數據可以得知，目前的新住民婚姻組合中，外籍女性佔了 88.5%。這樣的比例數字及現象，建構並形成了跨國婚姻移民主流社群的台籍男性與外籍女性跨國家庭性別組合。社會學研究如學者夏曉鵬（2000, 2001, 2002）認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台灣社會傳統的傳宗接代觀點及農村與勞動階層缺乏勞動力所致。過往，親子教養議題總是跨國婚姻家庭中的主流議題，而且，承擔者往往都是外籍女性。如果是外籍男性做為主體，親子教養是否會是主流議題之一，有待商榷。顯然，性別意識與跨國家庭婚姻組合型態之間有強烈的連動性，此種特性使得出自於跨國婚姻家庭孩子的課堂語言學習，每每呈現出父母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綜合決策之後的影響。

另外，雖然研究印證尚不多見，但是，可合理的推測，如一台一外跨國婚姻組合型態所形成的性別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台灣新住民家庭的語言使用及傳承。比方說，在主流的一台一外新住民家庭中，少數學者如鍾鎮城（2012）針對東南亞婚姻移民女性的研究，已發現台籍男性所使用的語言得到傳承的可能性遠高於東南亞外籍女性。然而，此類議題頗為複雜，當中也包含了語言意識形態、族群認同等因素與性別差異之間的相互作用。再舉另種一台一外類型如外籍男性與台籍女性的家庭組合為例，若是英語背景的外籍男性與台籍女性的組合，通常孩子的英語得到傳承的機會遠高於女性的華語，原因在於英語背後所傳達的全球化功能及語言權力意涵。因此，陳麗君（2016）在其研究中指出，「我們很清楚的知道，不是出生在雙親擁有不同語言的家庭就自然的能孕育出雙語人，處於邊緣化的族群更難能認同其語言文化進而傳承」（26 頁）。這樣的社會特性，顯現了主流文化或是先天結構的弱勢對於下一代語言決策有著一定程度的支配性。

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本次研究計畫的重點並非成人婚姻移民，而是在於因跨國移動現象而定居或是返台之國際家庭中的跨國銜轉（以下簡稱跨轉）孩子 1，研究者尤其對於跨轉孩子於國教系統就學時的語言決策感到好奇。當這些孩子跟隨著父母跨越國境至台灣教育場域就學而成為跨轉生時，因父母及其本身的生理及社會性別組合因素，可能影響了他（她）們對於家庭及學校課堂語言在使用及學習上的決策，而這樣的決策結果，對於他（她）們在語言意識及認同上的努力程度又可能會造成連動性的影響及反饋。不過，跨轉生的家庭組合雖然以一台一外居多，但是，在研究者這些年的追蹤研究中也發現，約莫有近 2 成的家庭組成是屬於父母雙方都是外籍者（以下內文簡稱雙外），甚至有一成多是屬於曾於國外生活或工作的台籍家庭（以下內文簡稱雙台）。此次的研究計畫提案，將囊括以上三種家庭組合類型。以下分述本研究計畫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研究原創性、重要性、預期影響性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此計畫的研究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跨國家庭父母性別與國籍組合之間所形成的家庭型態差異對於跨國銜轉學生語言習得、資源投放（investment）及認同上的影響。在此，所謂的家庭型態包含一台一外、雙台及雙外三類，而資源投放的概念，將於下文中詳述。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所衍伸的研究問題有以下三點：

研究問題 1：

不同家庭型態之父母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在其家庭場域中，如何影響跨轉生對於華語及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習得重要性之自我決策？

研究問題 2：

不同家庭型態之父母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在其課堂學習過程中，如何影響跨轉生對於華語及傳承語習得之資源投放？

研究問題 3：

不同家庭型態的跨轉生，性別差異於其語言認同建構歷程中形構了那些促進性的角色？

以上研究問題，在於解構父母本身的生理及社會性別與國籍及台灣社會主流性別文化互動之後，所產生的觀點如何作用於同處於此一家庭語境中的跨轉孩子；而跨轉孩子又如何以此家庭語境為資源，將其作用於學校語境內的語言習得。比方說，一台一外的「外」是女性或是男性，會如何影響跨轉孩子的語言認同與資源投放？家庭父母的性別類型對於跨轉孩子之家庭語言傳承，反映了什麼樣的語言決策結果？而語言決策的結果會造成什麼樣的語言認同資源投放？跨國銜轉學生的性別，又如何影響其對於家庭語言習得的選擇？等等。需特別強調的是，在本計畫中，研究者視性別為一種複雜社會有機體型態，因性別起於生理因素，但作用並不斷持續建構於社會模態（modality）之中。一如計畫徵求中所言明，此次性別與科技結合之研究：「著重具性別意識之研究，利用性別分析達到科技研究的創新發展，在研究過程中，納入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析視角，檢視科技領域現有觀點及內涵，提出具性別內涵之科技創新的研究。」因此，研究問題 1、2、3 將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因素納入，藉此探討跨轉生在語言習得、資源投放及認同上的主流再製（reproduced）及自我主體產製（produced）過程。

## 三、研究原創性與重要性

性別研究這幾年正於台灣學術領域中起步，而性別本身即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存有狀態（social being），因此，所有與性別議題直接或是間接相關的研究探討均可視為跨領域研究。

本研究計畫的原創性之一在於將性別與新興議題跨國銜轉相互連結，以解構性別因素於全球移動情境中的作用歷程。同時，因考量在地文化情境脈絡，所以特別聚焦於跨轉生華語文及傳承語習得方面的探討。台灣學界過往對於傳承語的研究，均著眼於境外，尤其以海外中文學校為焦點。而全球各區之華語文研究領域也確實都呈現相同的境況（He, 2008；Li, 2006；Xiao, 2008 & 2009；胡依嘉，2009）。此研究計畫延續研究者這幾年於跨轉生議題研究的主張，認為

對於傳承語的探討應放在學習者的移動脈絡之中，觀察其中的動態變化，而非僅視傳承語為一地域文化及族群語言之固態。

本研究計畫的原創性之二在於採用 Norton Peirce (1995) 的語言資源投放理論，並以其為論述基礎。研究者參照 Norton 的後結構主義及性別建構觀點，首次在台灣華語文教學領域嘗試連結性別與資源投放觀點。資源投放理論主張從社會文化 (social-culture) 脈絡去觀視第二語言習得現象，並強調認同的重要性，在 21 世紀的英語教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領域裡，此類視角及觀點已蔚為風尚，然而，台灣尚少見相關的探討。此計畫的提出，恰能凸顯此一研究議題價值的原創性。

本研究之研究重要性以下兩項：

### 1. 性別應是一種優勢符號與資源

如果跨轉生在傳統的性別意識及主流語言 (不熟悉華語) 之相互作用下，在學校場域中選擇沉默以自保，那麼，性別及語言的存在對其而言，即變成是一種制度性的壓迫與懲罰。因此，從性別觀點切入探討跨轉生之語言習得、傳承與認同議題，對於研究人員、教學現場老師及政策制定者而言，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可以擴增他 (她) 們對於性別產製脈絡的理解，並進而提升主流社群的性別敏感度，以協助跨轉生建構合宜、健康及具自信的自我角色。

### 2. 性別分析應是一種方法論

第二項重要性在於性別主流化概念的方法論實踐。以往的新住民研究都聚焦於成年女性，然而，對於國教階段的跨轉生而言，尚未有研究觸及其中的男女兩性探討。性別分析可以成為一種創新的科學檢視角度，協助研究領域進一步解析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的跨轉生族群，理解他 (她) 們如何透過性別、語言及存有的社會文化資源來觀察、親近並運作自己所處的世界。換句話說，性別分析可以成為跨轉生語言研究的方法論。

## 四、研究計畫預期影響性

國內外華語文教學領域對於性別語言及兒童華語習得方面的跨領域研究極為少見。以後者 (兒童華語習得) 而言，近年來，因為國際學校及跨轉生語言研究的興起，正逐漸的積累相關發現以形成觀點。然而，遑論社會建構觀點上的性別探討，華語文教學領域的性別觀，大部分依然停留於因結構生理觀點而產生的性別與語言特徵。因此，此項研究計畫的切入角度，可初探華語文與性別之跨領域研究可能性，開創學術先河。

再者，隨著國內學術界對於跨國婚姻及國際家庭之研究從成人為主體轉向孩子之際，研究者發現，國內華語文教學及外語教學領域對於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與性別差異之間的結合探討頗為欠缺。國教場域中的孩子正處於性別積極建構時期，且一如 Norton 和 Pavlenko (2004) 所言，性別應視為：“a complex system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differentially constructed in social context”。換言之，孩子的性別定位及性別觀養成，是透過與在地社群實踐及社會文化互動中不斷地修正而成。然而，在台灣國教場域裡的師生社群，如何讓孩子經由自我實踐以建構他 (她) 們的性別主體性？性別觀點及意識又如何地反饋於語言習得的過程之中？而跨轉生的第二語言 (華語文) 及傳承語扮演著何種媒介角色以協助性別因素作用於各個學習面向？性別又透過何種方式以形塑並投放於跨轉生的語言認同？這些問題，都亟待更多的研究

探討，也是此研究計畫可促成預期影響性的主因。

## 五、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

在華語文教學研究領域裡，少數涉及性別議題研究成果均以性別為研究變項，探討生理性別因素對於語用的影響。如張絮茵（2009）選擇了商務上常用的拒絕語為研究主題，並以三種社會地位與兩種性別作為研究變項，認為有必要先探討母語人士在商務上的拒絕策略，並應用至教學層面。結果顯示，男性在拒絕策略上，是資訊取向式的舉出內、外在的實際阻因來表達拒絕，而女性則是情感取向式地向對方道歉並善意婉拒。同樣以性別角度探討華語語用層面的還有陳梅影（2006）、Kuo 及 Chen（2014）。陳梅影以北部某所私立大學不同系所為研究場域，以該校不同系所的男、女大學生各 50 名為研究對象，以開放式問卷調查請求、拒絕及道歉行為的道歉語選擇。結果發現，男性與女性皆在道歉行為中使用道歉語的頻率最高，又女性較男性常使用道歉語，且最常使用「對不起」。Kuo 及 Chen 則是研究台灣兒童的讚美語回應發展，探討讚美者的性別、社會地位和讚美主題等因素如何影響兒童的讚美語發展。結果顯示，男性讚美者的讚美多以能力為取向，而女性讚美者則以外觀為取向。然而，無論讚美者是男性或女性，受試兒童對於較為具體的讚美會給予較多回應。

除了語用，在社會語言學領域裡，亦有學者以性別的角度探討語音層面。Su（2012）以多種社會因素檢視臺灣華語音節末鼻音合流的現象（包含（ing）及（eng）之變異），結果顯示，地域背景與此變異現象的相關度最高；性別差異方面，與（ing）之變異有顯著的關聯，但與（eng）的關係較不明確。楊恬與劉榮（2015）則檢視了高年級留學生的課堂會話的補修情況，發現男女性在會話補修行為上有顯著的異質性，他們認為，男性在會話補修的總體能力上要強於女性，可能與其較維護面子、掌握話語權的文化意識有關。

在國內外的研究裡，與本計畫最相關的整合性研究成果應是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學者 Bonny Norton 所執行的一系列研究。Norton Peirce<sup>1</sup>雖然早於 1995 年即已提出資源投放概念，然而，經由一系列的研究實證及自我修正，Darvin 與 Norton 於 2015 年重新建構了目前國際上最廣為研究領域所知的資源投放理論（Model of Investment），並從三個面向解釋：認同（identity）、資本（capital）以及意識形態（ideology）。由下圖的資源投放理論架構圖（圖 1）中可以得知，此三個面向環環相扣，相互影響，形成了核心概念「資源投放」。以下將敘述其三個面向所代表之涵義以及其相互作用之後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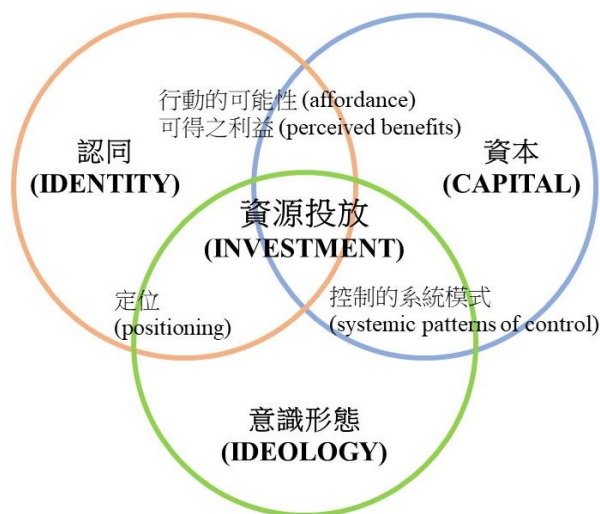
第一個面向，是意識形態。Darvin 和 Norton 認為，意識形態是特定社會場域之下的主流思考方式，在社會的重整與穩定，包容與排外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前是一個無論是人流、物流或資源等都快速移動的社會，在資源投放理論的架構圖中，當學習者帶著已有的性別、經濟、社會及文化資本，從母國移動至新的社會場域，其原有的資本價值就會受到該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挑戰，意識形態與資本的相互作用，形成了“systemic patterns of control”。舉例來說，一個以英語為家庭語言的菲裔孩子移民至加拿大之後，有可能因口音（accent）的問題，使其語言資本受到當地語言意識形態的影響或限制。Darvin 與 Norton 認為，透過意識形

---

<sup>1</sup> 研究者註：Norton 約於 1997 年以後，以“Norton”為名發表著述，在此之前則以“Norton Peirce”為名。本研究為尊重原作者，於引據相關文獻時將依循原著，使用“Norton”或“Norton Peirce”。



態，得以近距離地檢視權力是如何表現在各個場域，比如課堂、社區或是職場等。



(圖 1) Darwin 與 Norton 的 2015 年資源投放理論架構圖 (由研究者重新繪製)

第二個面向是資本。Norton Peirce (1995) 在資源投放理論發展的初期，即以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的資本理論作為其理論架構之一。Bourdieu (1986) 認為資本是一種權力，且不限於經濟與物質層面，更可以推展至文化與社會的概念上。因此，他提出了三種資本形式，分別是經濟資本 (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以及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當人們在國際間移動，面對不同社會場域的遊戲規則時，這三種資本會互相轉換，或是轉注成更為抽象的象徵資本 (symbolic capital)，它代表一個人的名望、地位、對社會的理解以及認知等。因此，透過象徵資本的隱喻，就不難理解資本其實是一個流動 (fluid)、動態 (dynamic) 的概念，且承受著來自特定族群或場域的意識形態。

資本概念對於促進資源投放理論的理解上十分重要，因為，社會場域的新進學習者都不是一張乾淨的白紙，他們都帶著性別角色、物質資源、語言技能、社會人脈網路以及教育背景等資本。再者，學習者並非只為了取得物質與象徵性資源而學習，他們也會再次利用所擁有的資本，並將其轉化為對所處社群來說更有價值的形式。由此可知，學習者踏入一個嶄新的社會場域時，其資本有可能會受到重視，變得更有價值，反之，若學習者的資本在該場域並不突出，其資本價值就會因不受重視而減低。總地來說，學習者所擁有的資本，和身分認同 (identity) 一樣，在不同的社會語境都必須再協商 (negotiate)，而且同樣都是一個持續彈性修正的狀態。如果珍視學習者所擁有的資本，將其視為優勢，那麼，這些資本就將會是身分認同與資本兩面向之間所稱的 “affordance” 以及 “perceived benefits”。

第三個面向是身分認同，Norton Peirce 於 1995 年針對五名加拿大移民女性所做的研究就已指出，認同並非是靜止的，它是一種動態抗爭的過程，並且會隨著時空的不同而相應調整。然而，Darvin 與 Norton 在重新建構資源投放理論的架構時，將身分認同進一步闡明為一個人的慣習 (habitus) 與期望 (desire) 之間、意識形態與認同想像之間的鬥爭。慣習為社會學專有名詞，通常指一個人的生存狀態，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的世界觀。因此，慣習可以為主流意

識形態下的思考與行動提供一個概念性的解釋。在資源投放理論架構圖中，身分認同與意識形態兩個面向相互影響之下的結果是促成自我定位 (positioning)。也就是說，某個場域的主流意識形態會藉著學習者的性別、種族、社會階級或性傾向等來定位學習者可能形塑的身分認同，反之，學習者也可以拒絕這種形塑機制，反過來影響他人的自我定位。以下透過更多文獻之探討，以清楚呈現本計畫所處的性別及第二語言習得之學術脈絡。

## 六、重要文獻評述

### 1. 「個體」的重新概念化

在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Krashen (1985) 所提出的五個假說，深深地影響了語言教學領域。該五個假說分別為輸入假說 (input hypothesis)、習得與學習假說 (acquisition learning hypothesis)、監控假說 (monitor hypothesis)、自然順序假說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和情意濾網假說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等。在情意濾網假說中，Krashen 將濾網視為學習語言時的心理障礙 (mental block)。他認為，語言學習者在缺乏動機 (unmotivated)、自信低落 (lacking in self-confidence) 以及焦慮 (anxious) 等三種情況下，將無法有效吸收語言課堂上的知識。他並強調，當情意濾網起了作用，語言學習者或許可以瞭解其所接收的語言訊息，但是，這些訊息將無法有效進入語言習得裝置 (LAD)，因此，只有在情意濾網最小化的情況下，學習者才有可能融入當下情境，暫時忘記自己正在聆聽或閱讀另一種語言。

然而，為何語言學習者會缺乏自信、動機不足，甚至產生焦慮感？Norton Peirce (1995) 認為，在二語習得理論中，情意濾網假說並未將社會語境 (social context) 納入考量，使這個命題缺乏了一個適切的解答。她認為，情意濾網假說所包含的動機、自信與焦慮感高低，都僅涉及「個體」(individual) 本身，這些描述都是單向度的 (unidimensional)、非歷史性的 (ahistorical)，它們清楚地一分為二，沒有模糊地帶。語言教育中常以內向 (introverted) 與外向 (extroverted)、場依賴性 (field-dependent) 與場獨立性 (field-independent)、拘謹 (inhibited) 與開放 (uninhibited)、高度動機 (motivated) 或低度動機 (unmotivated) 等偏向二元對立的特質描述學生，但這些都忽略了學生的性別角色、身分認同、個人經驗等社會建構之下等因素。也就是說，這些對於語言學習者的特質描述，僅限於個體變項 (individual variable)，既捕捉不到目標語學習者與語言社群 (language community) 之間的關係，亦無法論述目標語學習者與目標語人士之間在彼此權力關係不對等 (inequitable relations of power) 之下的互動樣態。

若從社會與歷史建構下的語境看待學習者與社會間的關係，勢必得將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的「個體」重新概念化。Norton 以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1977) 的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概念，提出了「資源投放」的理論，並以此作為「動機」概念的再延伸。資本 (capital) 一詞，原來自於經濟學的範疇，Bourdieu 將其範疇從經濟、物質層面延展至文化及社會層面。他並進一步將資本分為四種形式：經濟資本 (economic capital)，由生產要素 (如廠房、土地)、財產、收入等構成；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是知識能力的總和，舉凡語言、價值觀、稟性 (disposition) 等；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是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社會關係，與人之間的交往、聯誼等皆屬之；象徵資本 (symbolic capital)，可以從上述三種資本轉注而來，代表一種獲得認可的權威、信用，如一個人的名望、地位等，且在社會具有實際效果上的優勢。

進一步來看，文化資本有三種形式：內化的形式、外在的形式以及制度化的形式。內化的形式，即個人心理和軀體上長期積累的稟性 (disposition)，具體來說，就是個人所擁有的氣質、個性、舉止風範等；外在的形式，指存於社會的文化財貨，如書籍、名畫收藏等；制度化的形式，指受到特定社會語境之下所合法認可的各種教育資格與學歷。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場域中，文化資本的某種形式可能擁有較高的交換價值，是故，此處的資本除了原本經濟上的意義以外，更是一個經濟面的隱喻 (metaphor)。Norton 認為，「資源投放」一詞意味著學習者與目標語之間的社會與歷史建構關係，以及他 (她) 們在學習與實踐目標語時，時而矛盾與模稜兩可的意願。換句話說，當學習者意識到，目標語言的學習將為自己帶來更大範圍的象徵資源 (symbolic resources) 與物質資源 (material resources) 時，他 (她) 將會在目標語學習投注更多，以期轉而提高自身文化資本的價值；反之，若學習者認為教師的語言教學不能符應自己對語言學習的投注，儘管動機足夠，也可能使學習者減少課堂上的投注與實踐 (Norton & Toohey, 2011)。

透過資源投放的概念理解學習者，得以泯除單向度的個體思維，視學習者為一個擁有複雜認同的個體，這個認同，會隨著時空而有所變化，並在社會互動之下再現 (reproduce)。由此看來，當學習者使用語言溝通，並不僅限於單純的資訊交換，同時，學習者也正持續地透過語言整建「自己是誰」以及自我與目標語社會之間的關係。因此，目標語學習的投放就等同於學習者自我認同的資源投放 (Norton Peirce, 1995)。

## 2. 認同與語言習得

相較於動機高低的二元概念，「資源投放」較能描繪性別、歷史、權力、身分認同 (identity) 與語言習得之間的複雜關係，讓研究者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在社會情境的建構下，檢視語言習得者與目標語社群之間因族群、種族、文化、性別、性向、社會階級、社經地位等因素之不同，所形塑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並論述學習者為何對於目標語學習抱持著時而矛盾且不一致的態度。與第二語言習得的個體 (individual) 概念不同，在資源投放的視角下，個體並非單一向度的概念，因此，Norton 嘗試引入 Weedon (1987) 「女性主義的後結構主義」(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m) 中「主體性」(subjectivity) 的概念，以期與第二語言習得的個體概念區分開來。

後結構主義所論述的主體 (subject)，具有多樣化 (diverse)、非單一 (non-unitary)、動態 (dynamic) 等特質。Weedon 用主體一詞來指涉個體，她並認為，個體是在語言中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透過語言實踐，他 (她) 可以掌控 (subject of) 權力，同時，也可能屈服於 (subject to) 權力。Norton 將主體的概念，進一步延伸至認同的概念，她認為，既然個體能經由語言的實踐宣示自己的主體位置，當然，也能透過話語不斷地整建自己與目標語社會之間的關係。以下分述 Norton 所主張的三種主體性特性：

首先，主體具有多樣態的本質 (multiple nature of the subject)，相較於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所論述的個體，是獨特 (unique)、固定 (fixed) 且連貫的 (coherent)，後結構主義所論述的個體，具有多樣 (diverse)、相互矛盾 (contradictory) 與動態 (dynamic) 等特性，是一個主體性 (subjectivity) 的概念。這樣的主體性，來自於不同的社會場域，以及個人不同的主體位置 (subject position) 所建構之下的權力關係。舉例來說，一位女性可能同時擁有多種主體位置，她是母親、女兒、家庭的主要照護者、公司員工等，這些主體位置可能因不同的社會場域而相互矛盾。

再者，主體性本身是一個抗爭的場域（subjectivity as a site of struggle），它並非被動的，在特定的場域、社群及社會中，主體有可能掌控權力，也有可能屈從於權力。也就是說，主體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agency）。最後，主體性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subjectivity as changing over time），這呼應了主體性是動態的。Norton 的研究個案 Eva，於 1989 年以難民身分初抵加拿大時，因為說得一口流利的義大利語，她選擇在義大利餐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她為了給自己更多練習英語的機會而換了工作。起初，Eva 認為自己的身分是移民，她認為沒有人重視她的存在，所以也不主動開口與同事講話。但是，職場上的邊緣化，讓她開始打破沉默，一旦話題來到了她可以發話的當下，她不會等其他人沉默，就逕自加入對話。Eva 意識了自己的話語權（right to speak），並透過話語權的宣示，重新形塑自己的身分認同，從移民變成了一個具有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公民。

綜上所述，或許就可以解釋，為何學習者在某些情境下會積極參與對話，而在某些情境下，卻又選擇沉默不語。若以個體面向來描述學習者，選擇在對話中沉默的學習者，有可能會被視為學習動機不足、生理性別不利、較為內向或是語言能力不足等。然而，若從資源投放的概念來看，得先瞭解語言學習者對於該語言的認同與投注的樣態為何，才能進一步探究學習者為何會如此表現。

## 七、研究方法

當依從女性主義的後結構主義（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m）觀點以談論性別時，性別就脫離了個體變項（individual variable）的範疇，必須在社會與文化的語境下談論。也就是說，性別一詞，已經不是單純的「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分野關係，而是一種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概念。在後結構主義中，主體位置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會因其種族、文化、階級、性向、能力、年紀、社會地位等因素而變得複雜（Pavlenko, 2001）。Freedman（1997）認為，當研究性別與語言之間的關聯時，存在著兩種傳統：第一種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檢視男女性在社會互動中如何使用語言；另一種則是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檢視文化上具有特定的語言意識、較受偏好的某個性別角色，是如何透過行為、立場或活動而構成。

然而，在女性主義的後結構主義中，Norton 與 Pavlenko（2004）不假設所有的男女性都因其生理結構或是社會角色，使彼此有許多共通點，或是性別差異永遠都與語言學習的成果有所關連，而是，將性別視為社會認同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說，在此研究計畫中，當研究者試圖架構跨轉生的語言習得經驗、軌跡以及成果時，必須考量他（她）們的性別、種族、社會階級與地位、性向、能力、年紀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基於上述考量，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將採用敘事研究，針對所選定的多個跨轉生個案，蒐集並分析性別差異於其家庭及學校語境之存在脈絡，並探討語言習得、認同、資源投放三者與性別差異之間的互動關係及歷程。Clandinin 和 Connelly（2003, 蔡敏玲、余曉雯譯）主張，敘事研究本身是一種專注於理解研究參與者經驗的過程。當敘說者個人經驗的連續性及整體性透過語言脈絡而呈現時，讀者或是閱聽者即可同理於語境線索，甚或從中找到感同身受的共鳴。換句話說，敘事研究是探求實踐歷程並肯定敘說者經驗的一種研究方法論。Clandinin 和 Connelly 強調：

它（敘事研究）是研究者和參與者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一個或一連串的地點，並且在與環境的社會互動中，所建立起來的合作。探究者進入這個陣仗的中心，以同樣的精神前進，斷定這個探究仍在生活和敘說、回想和重述之中，以及斷定那些構成人們生活經驗的故事，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頁 29）。

本計畫應用敘事研究做為主要研究方法（請見下表 1），研究者透過長期的課堂觀察，紀錄跨轉個案孩子言談現象中所映現的性別及語言面向，同時，研究者也針對孩子及其父母、師長採取隨機與深度訪談方式，循環且多次的探詢性別因素與語言習得、認同及資源投放之間的實踐歷程。在訪談時，研究者依個案孩子的語言經驗、習慣及能力，隨時調整專業術語，並拉長等待及回應時間。下表 1 整理上述所提及的研究方法於本研究計畫中的作法及方法特性。

表 1. 敘事研究採納邏輯

研究方法	研究作法	研究方法特性
敘事研究	透過場域觀察、深度訪談、田野日誌及教學材料，以組織、歸納並分析性別差異於個案歷時脈絡之影響性，藉以呈現出個案本身的複雜性及主體建構性（subjectivity）。	能呈現出家庭型態與性別差異之間的動態性，同時凸顯性別因素於跨轉個案語言習得、認同及資源投放之特殊性。

## 1. 資料蒐集

此研究計畫從高雄市已簽署國家系統建置及研究同意函的百來位跨轉生中擇取 8 位 5-9 年級的跨轉生為個案，並以其為主要參與者。跨轉生的身分判斷以是否需要華語文教學支持為依據，所以，每位已成案追蹤並得到語言支持的學生都會維持一至數年的跨轉生身分，理想上，直至他（她）們的華語文可以達到利用華語文以學習華文及各類學科知識技能的程度，他（她）們才會判定為結案，此時在國教系統中將不再具有跨轉生身分。

本計畫之所以選擇 8 位跨轉生，是因為研究者認為，此計畫至少需包含 3 種家庭類型，而在一台一外的家庭類型中，又包括了兩種亞型（請見下表 3），因此需要 4 位個案。而 4 種個案中若每種都要存在著男女兩性，則至少要有 8 位跨轉生。至於選擇 5-9 年級，原因在於此時期的孩子已有生理性別之第二性徵出現，而原有的語言及認知功能已逐漸開展，此時探討性別、語言習得、傳承語、資源投放及認同等議題，在研究操作上，更具可行性。

另外，在次要參與者方面，本計畫包含了個案家庭場域中的父母，以及個案學校場域中的華語老師（以下簡稱華師）與班級導師。在個案父母方面，研究者原計畫邀請雙親結構的家庭，以完善跨轉生性別分析研究的典型。然而，因本研究於個案揀選時已設定若干條件，包含個案來源須涉及 3 種家庭類型、越南背景個案須為總人數之 1/2 以及單一性別不低於 1/3 等條件。因篩選資料庫時，完全符合條件之個案數不足 8 人，因此，研究者最後決定將單親與重組家庭納入。要注意的是，此點並非是對於單親家庭及重組家庭的歧視，研究者之所以不選擇單親與



重組家庭，是因為單親家庭中的生理性別因素會因角色關係而重疊，重組家庭的探討容易涉入許多個人情感因素，讓此次性別研究的焦點掌握充滿不確定性。也因此，最後針對單親的個案，研究者並未訪談其家長。至於華師及班級導師部分，考慮其角色穩定性，研究者選擇了已對個案有所了解並能長期教授者。

資料蒐集來源及蒐集方式，呈現如表 2。研究者以場域觀察日誌、隨機與深度訪談為主。場域觀察以及教師日誌或教師教學（含教材）、課程會議文件蒐集的重點，如實呈現並反映個案在語言習得（華語及傳承語）、資源投放及認同建構方面的過程及動態性。隨機訪談部分是為確認突發且具有追蹤及確認價值的信息而設定。至於深度訪談之大綱，乃依以下本研究計畫所擬定之三題研究問題而布建，平均訪談時間分別為個案 15 分鐘 21 秒、家長 12 分鐘 8 秒、華師 9 分鐘 28 秒以及導師 8 分鐘 34 秒。在訪談語言上，以華語、越南語、日語、英語或是雙語並行，而在雙外家庭或是一台一外家庭的型態中，研究者亦邀請了日語以及越南語翻譯隨行，以利訪談之進行。

#### 研究問題 1：

不同家庭型態之父母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在其家庭場域中，如何影響跨轉生對於華語及傳承語習得重要性之自我決策？

#### 訪談大綱重點：

探究家庭場域中的父母性別角色對於個案在華語及傳承語習得重要性上的決策影響。

#### 研究問題 2：

不同家庭型態之父母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在其課堂學習過程中，如何影響跨轉生對於華語及傳承語習得之資源投放？

#### 訪談大綱重點：

探究家庭資本中的性別觀點，如何影響課堂中的華語及傳承語習得之資源投放。

#### 研究問題 3：

不同家庭型態的跨轉生，性別差異於其語言認同建構歷程中形構了那些促進性的角色？

#### 訪談大綱重點：

探究性別差異與語言認同建構之間透過那些策略、事件及途徑……等互動。

本研究所蒐集之語料話語量，按照其性別比例統計，為單一性別不少於 1/3（3 位女性，5 位男性），按國內跨轉生來源國之比例原則，為越南背景學生占總參與者比例的 1/2（4 位越南背景跨轉生）。

表 2. 資料蒐集統整表

學校編碼	研究法	期程	資料來源	實際數量	
GRE	敘事研究	2020年11月12日 至 2021年07月27日	觀課紀錄	共20份	
			訪談逐字稿	<p>上學期末，個案、華師、導師與家長各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4次。兩名個案計共8次。</p> <p>下學期，兩名個案分別在期初與期末各進行一次訪談，他們的華師、導師與家長則分別進行一次深度訪談，但其中一名個案學生家長因在研究期間出國受疫情影響無法返台接受期末訪談，故計9次。</p>	共17份
觀課紀錄	共10份				
LZE	敘事研究		訪談逐字稿	<p>上學期末，個案、華師、導師與家長各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4次。</p> <p>下學期，個案分別在期初與期末各進行一次深度訪談，華師、導師與家長則分別進行一次訪談。共計5次。</p>	共9份
				觀課紀錄	共10份
KXE	敘事研究		訪談逐字稿	<p>上學期末，個案、華師、導師與家長各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4次。</p> <p>下學期，個案分別在期初與期末各進行一次訪談，華師、導師與家長則分別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5次。</p>	共9份

WFJ	敘事研究	觀課紀錄	共4份	
		訪談逐字稿	上學期末，個案、華師、導師與家長各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4次。 下學期，個案因結案僅在期初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導師與家長則分別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3次。	共7份
LHE	敘事研究	觀課紀錄	共10份	
		訪談逐字稿	上學期末，個案、華師、導師與家長各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4次。 下學期，個深度案在期初與進行一次訪談，期末訪談因疫情取消，華師、導師與家長則分別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4次。	共 8 份
GWE	敘事研究	觀課紀錄	共 5 份	
		訪談逐字稿	上學期末，個案、華師、導師與家長各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4次。 下學期，個案因結案僅在期初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導師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2次。	共 6 份
FKE	敘事研究	觀課紀錄	共10份	
		訪談逐字稿	上學期末，個案、華師、導師各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3次。 下學期，個深度案在期初	共6份



				與進行一次訪談，期末訪談因疫情取消，華師與導師則分別進行一次深度訪談。共計3次。	
--	--	--	--	--	--

## 2. 資料分析

下表 3 是此計畫之分析架構表。左側欄位分別代表三個主要研究的問題項，右上方欄位則是 3 類 4 種家庭型態。資料分析以回答 3 題研究問題為主軸。另外，依性別研究之方法論所蒐集之語料話語量，統計出其中的性別比例及來源，單一性別不少於 1/3。另所有資料的處理，均已交由參與者詳閱並同意，再以性別差異作為分析歸納的主題進行標註分析，故統一彙整最終資料予以性別角度探討其中的歷程、脈絡及各式動態回應本研究目的與問題。

表 3、跨國生個案資料分析表

父母性別與國籍組合		一台一外家庭		雙台家庭	雙外家庭
		Type 1： 台父+外母	Type 2： 外父+台母	Type 3： 台父+台母	Type 4： 外父+外母
跨轉生語言習得、 資源投放及認同建構	男	2	1	0	2
	女	1	0	1	1
跨轉生之課堂資源投放 (華語、傳承語)	男	2	1	0	2
	女	1	0	1	1
跨轉生之語言認同建構 (華語、傳承語)	男	2	1	0	2
	女	1	0	1	1

## 八、研究發現與討論

如同上表 3 所示，本次研究來自於 3 位 type1(台父+外母)跨轉生個案、1 位 type2(外父+台母) 個案、1 位 type3(台父+台母) 個案和 3 位 type4(外父+外母)個案。而這些來自不同家庭類型之 8 位跨轉生個案，所顯示出的生理與社會性別建構及其和語言之間的互動關係，極為隱晦。在跨轉生的家庭場域及學校課堂學習過程中，大致可歸納出不同家庭型態之父母生理與社會性別差異，對於華語及傳承語的習得及資源投放，並未產生明顯的直接影響。以下依照本研究擬之三項研究問題，以列點方式分別呈現研究發現。

### 研究問題 1：不同家庭型態之父母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在其家庭場域中，如何影響跨轉生對於華語及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習得重要性之自我決策？

就以 type4(外父+外母)家庭來說，舉 WFJ 學校的跨轉生個案 Jin 為例。Jin 的雙親都是韓國籍，因此當被問到家庭中的語言習得決策時，他們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他們的母語就是韓語：

訪：那家裡用韓文這一件事情呢，通常是由誰決定？

父：喔...不是誰來決定的問題，因為我們全家人的國籍在韓國那裡，所以呢，我們不知不覺自然的...我也說韓語，太太也是，孩子們都是，從小時候一直...說韓語。

（深度訪談-家長-WFJ，20210113）

但是，當 Jin 被問及語言之間的重要性，也就是語言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時，他認為韓語和華語兩者同等重要。但是，因為他現在身處台灣，所以華語較為重要。以下為 Jin 的個案訪談語料：

訪：那你自己覺得爸爸會認為，你的華語比較重要，還是韓文比較重要？

金：嗯...兩個都重要，但我現在住在臺灣，所以，我覺得華語比較重要一點點。

訪：你認為爸爸覺得華語會比較重要一點，是因為你現在在臺灣這一邊讀書。

（深度訪談-個案-WFJ-Jin，20210427）

同時，身為男性的 Jin 的回答也同於其他 7 位跨轉生個案，他們都一致認為，各自生理性別的差異不會影響他們父母的語言期望。以 Jin 的訪談語料為例：

金：嗯...因為不管我是男生還是女生，我住在臺灣，所以要用中文(華語)，嗯...所以我爸爸覺得中文(華語)應該會比較重要。

訪：嗯，因為在臺灣這一邊，所以華語比較重要這件事情，你覺得不會因為你是女生，所以會改變。

金：對。

（深度訪談-個案-WFJ-Jin，20210427）

所以，關於研究問題 1，研究者認為，在家庭場中，不同家庭型態的父母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並不直接或是顯性地影響跨轉生對於華語及傳承語習得重要性上的決策。然而，那些原因會影響跨轉生的語言決策呢？性別差異與語言之間可能呈現什麼樣的動態關係呢？此部分的說明將於結論提出。

### 研究問題 2：不同家庭型態之父母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在其課堂學習過程中，如何影響跨轉生對於華語及傳承語習得之資源投放？

關於此研究問題之探勘，以 LHE 學校的 type3(台父+台母)的 Huang 為例。Huang 從日本回台，在日本從幼兒園就讀至小學六年級，在家中有一位姊姊、一位妹妹，和父親及姊姊主要是使用華語和日語(尤其是前者)交談，和母親則大部分是使用日語，至於和妹妹則是以日語為主。當需與學校溝通時，Huang 的母親是主要的窗口，然而，父母之間卻已有語言共識。換

言之，當與學校溝通時，在過程中是無法呈現出父母生理及社會性別差異的影響，因為母親是以共識下的代理人身分進行親師溝通。以下所呈現的是 Huang 本身的訪談語料：

訪：好，那下一個問題，是在家裡面是爸爸還是媽媽，主要跟王老師溝通？

黃：嗯...是媽媽。

訪：主要是媽媽，嗯嗯，好，為什麼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媽媽跟老師溝通，不是爸爸？

黃：嗯...媽媽有...呃那個...媽媽...有那個...我的老師的那個 LINE，可是爸爸沒有.....

訪：妳覺得，在學校課堂的學習過程中，媽媽認為哪一個語言對你（妳）比較重要？

黃：在學校，中文。

訪：媽媽認為，妳的中文比較重要，在學校.....那爸爸呢？

黃：我覺得爸爸也是...中文。

（深度訪談-個案-LHE-Huang，20210106）

而 Huang 的導師跟其他大部分研究個案的導師一樣，並不知悉父母親對於孩子在課堂語言表現或選擇上的期望，而父母親也都在訪談語料中呈現出對於主流教育體制作法上的接受。下則語料是導師訪談之佐證：

訪：就您與學生父母親溝通的經驗而言，學生父母親對於孩子在課堂上的語言表現或語言選擇上的期望為何.....

王：我覺得我沒有.....我接收不到他們的期望這個訊息欸.....

（深度訪談-導師-LHE，20210105）

不過，Huang 的親師溝通代理人現象，在三個月後，隨著 Huang 的華語能力的增長而產生了變化。溝通工作如非必要，已經大部分由 Huang 自行處理，如以下語料所示：

王：.....溝通方面，她現在...我跟她媽媽比較少溝通了欸，就是(Huang)她會自動跟我說。

訪：喔，因為上個學期我們在問這問題的時候，主要與老師溝通...

王：媽媽。

訪：是媽媽對不對？

王：對，然後這學期...(Huang)她會自動來跟我說了，她可以講的字彙啊跟詞比較多了，句子也可以講得比較長一點點，所以這學期主要就是(Huang)她會來跟我溝通。當然還是會有...好像也有溝通一次啦.....

（深度訪談-導師-LHE，20210414）

顯然地，如同 Norton Peirce（1995）所言，語言是一種資本。而隨著資本的累積，不同溝通場域的言談方式也隨之變化。Huang、母親和導師三者之間的互動方式即是一例。

### 研究問題 3：不同家庭型態的跨轉生，性別差異於其語言認同建構歷程中形構了那些促進性的角色？

針對研究問題 3，此研究未能發現明顯的事例，以證明性別差異在不同家庭型態中的跨轉生個案中形構了認同建構的角色。以 Type 1(台父+外母)LZE 學校的男性個案 Li 為例，Li

的父親為台籍，母親為越籍廣東裔，而在家中一般與父親使用華語，與母親則使用廣東話，至於在影音平台娛樂的閱聽上，如 Youtube 影片，則習慣觀看越南語影片。而在針對導師籍華師課堂所做的場域觀察中，都未發現性別與語言認同兩者之間的明確互動資料。不過在 Li 的訪談中，倒是呈現了因時變化的一些事例。

Li 剛開始並不認為性別跟他所持語種之間有認同的相關性，因此，他提到講華語和講粵語的他，兩者並無二致。可是，兩個月過去之後，相同的問題再訪問一次，他卻提到，他認為講粵語的自己會看起來比較厲害，以下是訪談語料：

訪：那你覺得因為你是男生，你覺得你講華語的時候跟講粵語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李：都差不多。

（深度訪談-個案-LZE-Li，20210312）

訪：那你當然你自己是就男生嘛！你覺得你講華語的時候跟講就是粵語廣東話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李：我講粵語的時候比較厲害，講國語(華語)的時候、有時候不知道要說什麼。

（深度訪談-個案-LZE-Li，20210507）

同時，Li 也在初始的訪談中提到，比較喜歡自己說粵語的樣子，但是當問及語言與性別之間的關係時，他認為自己不曉得這答案也從未想過。不過，在 2 個月及 4 個月後的再次訪談中，Li 提到說粵語的自己，會表達得比較清楚，比較像是男生。佐證語料如下：

訪：那你自己會比較喜歡自己講華語的樣子還是粵語的樣子？

李：粵語。

訪：那你覺得你講粵語的時候比較像男生還是講中文華語的時候比較像男生？

李：不知道！沒想過！

（深度訪談-個案-LZE-Li，20210108）

訪：好，那你覺得你講廣東話(粵語)的時候比較像比較像男生還是講中文(華語)的時候，比較像男生？

李：廣東話(粵語)。

訪：好，為什麼？

李：因為我說國語(華語)的時候，說得比較沒有這麼清楚。

訪：好。（深度訪談-個案-LZE-Li，20210312）

訪：那你比較喜歡自己講華語的樣子還是廣東話(粵語)的樣子？

李：粵語。

訪：那你覺得你講就是廣東話的時候比較像男生？還是講中文的時候比較像男生？

李：粵語。（深度訪談-個案-LZE-Li，20210507）

## 九、研究結論與建議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性別因素幾乎無所不在，但是，大部分的個案所顯示的與性別要素相關的現象卻極為幽微隱晦，常常不以男性、女性或是兼有的型態呈現，最常見的反而是中性概念。換句話說，學校教育場域在思考跨轉生語言與性別之間的互動性，甚至是一般學生的語言與性別之間的動態關係時，常常以中性概念思考性別。老師們清楚的知悉學生的生理性別，但是，在性別與語言兩者之間的認同流動或知識建構中，大部分老師是不存在著力點的。

再者，若回到此項研究所聚焦的父母性別差異與家庭場域型態主題來看跨轉生的語言、資源投放與認同建構，也會明顯發現，僅有極少數跨轉家庭個案實施清楚的家庭語言政策 (family language policy)，他們能清楚的敘說在家庭中重視某些語言的結構性原因(如：父母本身的語言能力與語言意識)，相對地，大部分個案家庭都會在訪談中提到，就是一種自然狀態。同時，幾乎所有跨轉生的學校導師都不了解跨轉生家庭中的語言使用型態，對於父母的語言期望也不太清楚。以上現象，明白的指陳出跨轉生的家庭與學校教育場域兩者之間，是彼此分隔的狀態。以至於家中的兒子或女兒角色建構，到了學校只剩中性，或是集體概念下的會講華語的男生與女生兩類集體性別概念。

最後，若緊扣資源投放概念，則會發現，在跨轉生從身份隱藏至身分凸顯的變化過程中，跨轉生的性別建構與語言能力發展之間的關係也會隨之改變。當跨轉生在台灣主流國教體系中所展現的華語文能力越精熟、學習成就越好時，他們會越有自信展現並投放資源於個人和同儕之間的語言與認同差異；而隨著自信的增長，在研究中，有數位受訪的跨轉生個案也明確提到，他們會更自在且樂意讓別人知悉他們和同儕之間的不同，同時，也更肯定如 Norton Peirce (1995) 所言之自身主體狀態的產製。相對於這數位跨轉生，其他個案僅會選擇加入主流的再製，隱於眾人，以成為眾人的一份子。

因此，此項研究進行一年之後，可提析出上述三段結論，然而，此項研究之限制也極為凸顯。主要原因在於執行時間的不足，再加上疫情的紛擾，使得資料蒐集的跨度不夠。如果有 2 至 3 年的執行時間，應能更清晰的描繪並組織出跨轉生的父母性別差異對其語言、認同及其學校教育的影響。故此建議，針對未來從事相關議題的研究者，或可保有更長的執行時間，或是做好長期研究的準備，以更清楚的挖掘出性別、家庭、學校機構與語言四者之間無所不在的隱含。

##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 (2020)。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 (含港澳) 配偶人數。2020 年 2 月 14 日，取自：<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
- 胡依嘉 (2009)。雙語能力與跨文化認同之對應——以南加州兩所中文學校為例。教育資料與研究，90，105-136。
- 夏曉鵬 (2000)。資本國際化與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 夏曉鵬 (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3, 157-196。
- 夏曉鵬 (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張絮茵 (2012)。商務漢語拒絕言語行為研究, 華語文教學研究, 9(1), 73-98。
- 陳梅影 (2016)。臺灣男、女學生於請求、拒絕和道歉行為的道歉語分析。中原華語文學報, (17), 1-28。
- 陳麗君 (2016)。「日久他鄉是故鄉」之後呢?--談新住民的語言教育發展的可能性。語文教育論壇, 10, 21-27。
- 楊恬、劉榮 (2015)。對外漢語高級口語課中的會話修補研究。華語學刊, (19), 8-22。
- 鍾鎮城 (2012)。移民華語教學：全球在地化的語言民族誌研究。台北：新學林。
- 鍾鎮城 (2017)。跨國銜轉孩子之系統建置研究與評估計畫 (執行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 Bourdieu, P. (1977). 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s.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16(6), 645-668.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F.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58). New York, NY: Greenwood Press.
-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3).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蔡敏玲、余曉雯譯。台北：心理。
- Darvin, R. & Norton, B. (2015) Identity and a model of investment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5, 36-56.
- Freedman, R. (1997). Researching gender in language use. In N. Hornberger and D. Corson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 8,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47-56.
- He, A. W. (2008). A identity-based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In Agnes Weiyun He & Yun Xiao (E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 109-121). Boston, MA: Cheng & Tsui Company.
- Krashen, S. D.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NY: Longman.
- Kuo, C. Y. H., & Chen, D. C. Y. (2014).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iment responses by Taiwanese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1(4), 1-40.
- Li, G.(2006). The role of parents in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s home practices. In Kimi Kondo-Brown(Eds.),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focus on east Asian immigrants* (pp. 15-31).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Multicultural Matters*.
- Norton Peirce, B. (1995) Social identity, invest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29(1), 9-31.
- Norton, B. & Toohey, K. (2011). Identity, language learning, and social change. *Language Teaching*, 44, 4, 412-446. (State-of-the-Art Article).
- Norton, B., & Pavlenko, A. (2004). Addressing gender in the ESL/EFL classroom. *TESOL Quarterly*, 38(3), 504-513.
- Norton, B., & Pavlenko, A. (Eds.). (2004). *Gender and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lexandria, VA:

TESOL Publications. (200pp).

- Pavlenko, A. (2001). Language learning memoirs as a gendered genre. *Applied Linguistics*, 22, 213–240.
- Poplack, S. (1993). Variation theory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D. R. Preston (Eds.), *American Dialect Research* (pp. 251-286). Amsterdam, Holland: John Benjamins.
- Su, H. Y. (2012).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syllable-final nasal mergers in Taiwan Mandarin: a variation stud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4), 767-802.
-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UK: B. Blackwell.
- Xiao, Y. (2008).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in CHL development. In Agnes Weiyun He & Yun Xiao (Eds.), *Teaching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pp.151-166). Boston, MA: Cheng & Tsui Company.
- Xiao, Y. (2009). Teaching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keys to success. In Michael E. Everson & Yun Xiao (Eds.),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pp. 42-66). Boston, MA: Cheng & Tsui Company.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鍾鎮城		計畫編號：109-2629-H-017-001-			
計畫名稱：父母性別差異於跨國銜轉學生語言習得、資源投放及認同建構之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正在撰寫中
		研討會論文	0		將於明天七月前完成1-2場的發表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2		其中一位碩士生因此計畫之參與，而完成相關主題之資料蒐集與分析，目前已通過碩士論文口試。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無			